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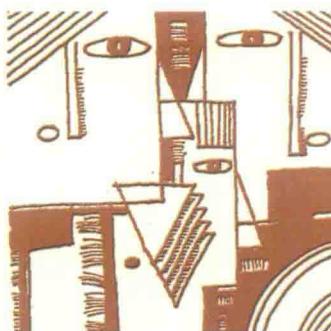
本辑焦点：心理健康与文化

(Mental Health and Culture)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杨宜音／主编
井世洁 李凌／本辑特约主编

中国 社会心理学 评论



第15辑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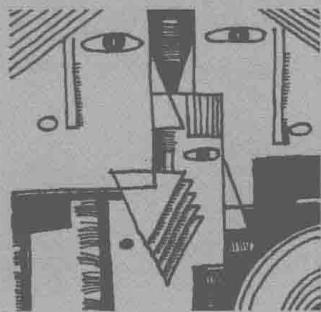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心理健康与文化：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卷首语） 井世洁
情绪表达矛盾一定会带来心理症状吗？文化规范的调节作用 常保瑞 谢天
空巢VS.满堂：居住安排对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 翟小敏
文化安全保护在民族认同与文化依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 利爱娟 杨伊生
生命的补偿控制：肿瘤幸存者的正义观与主观幸福感 吴胜涛 姜颖 王毓洲 张雅婷
出狱人身份的污名赋予、应对策略及动力研究
——基于J省T市26名出狱人的深度访谈 高梅书
女性独立性发展：从二元对立到自主选择 杨曦 李凌
中国文化视野下的empathy现象分析及其译名审视 蒋殿龙 赵旭东
多元文化咨询之本土化路径初探 王进 李强
中国躯体化？中国人抑郁与焦虑症状的文化表达 周晓璐 Andrew G.Ryder
创伤经历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机制评述 许丹
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谦虚与身心健康 施媛媛 张红川

禁外借



中国 社会心理学 评论

第15辑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5)

- 杨宜音 / 主编
- 井世洁 李凌 / 本辑特约主编
- 刘力 王俊秀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5辑 / 杨宜音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 - 7 - 5201 - 3709 - 6

I . ①中… II . ①杨… III . ①社会心理学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①C912.6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306 号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15 辑

心理健康与文化

主 编 / 杨宜音

本辑特约主编 / 井世洁 李 凌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佟英磊

责任编辑 / 佟英磊 张真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709 - 6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集人文社科之思 刊专业学术之声

刊 名：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主 编：杨宜音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Vol.15)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委员：陈午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方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康萤仪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院
刘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徐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杨宇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叶光辉 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赵志裕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编辑部

联系电话：86-10-85195562
电子邮箱：ChineseSPR@126.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15辑

集刊序列号：PIJ-2005-005
中国集刊网：<http://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http://iedol.ssap.com.cn/>

主编简介

杨宜音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2010～201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主编。2016年起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社会心态、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在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00余篇。代表作有：《“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2001年总第13期〕、《个人与宏观社会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电子信箱：cassyiyinyang@126.com。

本辑特约主编简介

井世洁 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与心理健康相关议题，主要包括青少年群体的社会适应、严重精神病人的家庭抗逆力等内容。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心理科学》《青年研究》《社会科学》《美国家庭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Family Medicine)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相关学术论文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电子信箱：jingshijie@sina.com

李凌 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社会心理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高校心理咨询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包括自我发展与同一性建构、社会变迁与性别角色认同、心理需求与社会支持网络等内容。曾主持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在《心理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山东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相关文章或摘要曾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电子邮箱：lli@psy.ecnu.edu.cn

心理健康与文化：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卷首语）	井世洁 / 1
情绪表达矛盾一定会带来心理症状吗？文化规范的调节作用	常保瑞 谢天 / 16
空巢 VS. 满堂：居住安排对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	瞿小敏 / 40
文化安全保护在民族认同与文化依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	利爱娟 杨伊生 / 60
生命的补偿控制：肿瘤幸存者的正义观与主观幸福感	吴胜涛 姜颖 王毓洲 张雅婷 / 76
出狱人身份的污名赋予、应对策略及动力研究 ——基于 J 省 T 市 26 名出狱人的深度访谈	高梅书 / 90
女性独立性发展：从二元对立到自主选择	杨曦 李凌 / 119
中国文化视野下的 empathy 现象分析及其译名审视	蒋殿龙 赵旭东 / 142
多元文化咨询之本土化路径初探	王进 李强 / 157
中国躯体化？中国人抑郁与焦虑症状的文化表达	周晓璐 Andrew G. Ryder / 178
创伤经历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机制评述	许丹 / 198
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谦虚与身心健康	施媛媛 张红川 / 215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投稿须知	/ 233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 242

心理健康与文化：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

(卷首语)

井世洁^{**}

摘要：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中华文化传统，而今被卷入全球化与现代性转型之中的国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形塑”出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心理健康议题，更需要立基于文化视角的解读。国外跨文化取向的心理健康研究启发出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的“文化意识”，而华人心理学界基于“文化主体性”探寻而采取的一系列研究行动则有力地推动了以“生活现象”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体系和以“地域文化”为架构的心理健康理论体系的构建。在相当长时间内，研究和认识心理健康相关议题在本土文化中的属性与特征，发现和揭示本土文化与心理健康问题成因之间的关系，探索文化因素与心理健康促进及心理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方式的相互建构过程及特性应当成为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的主要目标。本辑共刊发 11 篇论文，其中既有从文化共量性角度对本土概念的探索、对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也有针对社会互动脉络中“生命经验”的深描，还有对文化因素与心理干预之间相互建构的尝试性探讨，展示了基于文化视角的心理健康研究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心理健康 社会变迁 文化主体性

*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SH130）的资助。

** 通信作者：井世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jingshijie@sina.com。

一 作为社会变迁晴雨表的心理健康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而“变革”背后的主要脉络便是“现代性转型”这一命题在中国的境遇及实现问题。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显然属于后发外生型，作为“对外部现代性刺激或挑战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回应”，现代化的任务以全面铺开的方式展开，“试图在同一时间里，实现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或社会的全面发展”（孙立平，1991）。它“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并“具有文明转型的意涵”，还被拿来与波兰尼的“大转型”和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相提并论（方文，2008）。

与现代化一样，全球化也是造成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所谓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受信息技术、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在世界观、思想、文化等方面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过程（Smith et al., 2013）。早在 21 世纪初，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 2001）便指出，信息技术及全球化给人类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人们谈论全球化比现代化更多（吴莹、韦庆旺、邹智敏，2017：191），因为它的发展进程之快、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到了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超然独处的地步。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不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正在进行变革，社会诸领域亦发生着深刻性、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变革，这会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烙上独特印记”，导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等“中国体验”的巨大变化（周晓虹，2014）。社会竞争加剧会导致压力感加重，生活节奏加快会带来紧张感增加，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会引起心理失衡，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会造成心理上的困惑，而社会陌生性增加则会导致归属感程度的降低，等等。与此相呼应，我国民众的“疾病谱”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严重危害民众的疾病不再是传统的传染病，而是与社会、心理、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息息相关的心理疾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 200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各类心理疾病患者人数在 1 亿人以上，占中国总人口的 7%。严重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 1600 万人（秦殊、李玲，2014）。有一项涵盖中国 12% 的成年人的大型调查发现，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 17.6%，其中心境障碍为 6.1%，焦虑障碍为 5.6%，物质滥用障碍为 5.9%（刘再春，2016）。心

理疾病的高发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李勇洁等，2014），造成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破坏（季晓军，2013），也给国家公共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

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通过多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 WVS）发现，现代化进程给人们带来物质的丰裕，而物质满足与生存安全保障将改变人们的人生目标、信念与价值取向，引导人们的生活追求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到追求更高级的个性化需求（吴莹、韦庆旺、邹智敏，2017：6）。2018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2712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974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达到 7.3%，“跑赢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经济增长质量获得了提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民众高质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需求日益凸显，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

为应对民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全方位需求，提高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保障和维护心理障碍者的权利，增进心理障碍者的治疗与福利，2013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为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2016 年 12 月，国家卫计委联合中宣部等 22 个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 号），提出到 2020 年全民心理健康意识明显提高和到 2030 年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普遍提升的基本目标，并进一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随后，2017 年 10 月，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卫计委和中国残联起草的《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民发〔2017〕167 号）印发，明确提出要在 2025 年基本建立以家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化、综合性、开放性”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可以说，近年来，整个国家对心理健康问题表现出了极大重视，全国各地针对心理健康的预防、咨询与治疗工作也在蓬勃开展。

当前，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中华文化传统，而今被卷入全球化与现代性转型之中的国家，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形塑”出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心理健康议题，更需要采用基于文化视角的干预策略。在西方国家已将心理健康的“文化差异”作为重要

议题予以考量,^①“社会文化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相互嵌入性”(Sam & Moreira, 2002)的观点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站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一时空交汇点上,深入探讨西方主要心理健康议题的文化适切性,并构建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健康议题的解释和干预框架。

二 心理健康与文化: 研究视角的因应性转向

(一) 心理健康研究的“文化主体性”意识觉醒

1. 对国外跨文化心理健康研究的借鉴与反思

文化作为“一套包括观念、实践及社会制度的松散组织系统”(Morris, Chiu, & Liu, 2015),能够反映某一群体共同具有和广泛习得的特征。文化会使针对心理疾病的体验及其相关症状存在差异;文化规范对症状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文化影响心理疾病的各种症状如何被解释和诊断;文化还会影响心理疾病会被怎样进行治疗(Castillo, 1997)。可以说,个体所拥有的文化塑造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并影响着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心理健康服务,因此理解文化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是心理疾病的准确诊断与治疗的关键(Eshun & Gurung, 2009)。

将文化与心理健康研究勾连在一起的尝试最早来自心理健康的跨文化研究路径。此路径秉持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e Psychology)的基本逻辑,保持传统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性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既有心理学理论进行检验,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在心理结构、心理能力方面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文化没有被看作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而是应该被“剥离”的因素(杨莉萍,2003)。这种“谋求适用于一切个体,并因而适用于整个人性的规律”的观点其实是文化绝对主义在心理健康研究中的运用。尽管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健康研究没有给予文化更多的关注,但它将文化因素纳入心理健康研究的范畴之中,为更深入地探究文化在心理健康议题中发挥的作用打下了一定基础。

与早期的跨文化研究路径不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文化取向的心理健康研究开始出现,此取向承袭了冯特早期的文化意识与维果茨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思想逻辑,将文化视为心理过程的“先在的”

^① DSM-IV-TR(2000)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界限症状(culture bound syndromes)这一心理障碍的新分类。

“决定性的”因素，认为人的行为（包括心理疾病的表达）应该被放在文化情境中予以解释，因为任何特定的心理过程都内在地蕴含文化因素，要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特有现象与问题出发，并尽力寻求应对与解决的办法。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在2001年发布的《心理健康：文化、种族和民族：对〈心理健康：卫生部部长报告〉的补充》报告明确指出，心理健康问题存在种族、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并且心理健康问题的类型与文化适应的程度有关。在不同文化群体中所做的心理健康调查也发现了不同文化群体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如孟加拉国以及印度部分地区，人们相信命运和宇宙的力量，而加拿大人更相信心理疾病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并且能控制疾病（Mulatu, 1999）。可以说，心理健康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升使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尽管基于文化角度的心理健康研究日渐增多，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全球化蔚为历史主流的当下，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中心，在这样一个不平等权力等级结构中，基于文化视角的心理健康研究依然是超级大国全球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对于心理健康的文化研究不过是在依赖他国的边陲地位中进行的，就好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而其重点任务则是将非西方文化安置在一个西方标准的价值规范中，借学术之名，行文化霸权之实（杨国枢，1987：9~10）。

2. 来自华人心理学界的文化主体性探寻

当今时代，经济迅猛发展、贸易繁荣、移民及社会流动加剧、族群互动频繁，多重身份与多元文化认同成为人们适应不同文化环境，保持心理状况平稳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心理机制（吴莹、韦庆旺、邹智敏，2017：161）。不管全球化带来“西式现代化”的势头有多么良好，“劣势社会”既有的一些文化传统与行事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被淘汰掉，本土旧有的与西式外来的模式会以某种方式平行并呈或交融混合地呈现（叶启政，2008：57）。在这一情势下，便需要在概念的使用、问题意识的提引、论辩思路的架构或研究策略的设计等方面，对西方既有的模式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警觉（叶启政，2008：72），建立以地域文化为架构的本土性理论知识，构建心理健康研究的主体性意识。因为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2002：360~361）。

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掀起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以“本土契合

性”作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程度的判断标准，对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概念与现象进行研究，成为世界体系中众多本土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Heelas & Lock, 1981)。在对“如何看待西方或北美心理学对其他地区学术与实务的支配现象做出反应”和“如何追求切合于本土社会文化的心理学知识但又朝向人类普同的理解”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基础上，有学者概括出强调“理论主体性”的“水平模式”和强调“生活主体性”的“垂直模式”(李维伦, 1995)。如果说“水平模式”是在摆脱欧美文化下的“白人中心主义”，向“建立地域性的本土心理学”的“非殖民化”心理学方向发展的话，强调“生活主体性”的“垂直模式”则是希望“在地的生活经验不再失语，而且有贴切而深刻的话语可说”(彭荣邦, 2017)。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更是全面唤起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发展现实的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引领下，心理学界提出了坚持中西比较、古今对照的原则，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以实现心理学本土化进程的中国本土心理学建设目标(汪新建、柴民权, 2014)。“突出常识、面向实践”，建构一种面向日常生活实践的“常识心理学”成为摆在心理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由于心理健康源自本地生活，因此相关研究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在地社群是否能够从它们“照见自己”，呼应人们说不太明白的感受和知觉，满足人们希望它们可以满足的需求。全球化背景下的心理健康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路径着力耕耘：一方面，要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以发源于生活中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为核心，探索以生活现象为本的知识体系，以使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行为风貌被清楚地掌握与认识；另一方面，在“贴近这生活的现象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以地域文化为架构”的心理健康理论体系。

(二) 基于文化视角的心理健康研究：本专辑论点摘要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都与她/他所处的文化相互构成，不但受历史文化制约，也深受地方性的人文精神影响，可以说文化与心理健康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本辑以文化与心理健康为焦点，共收集到11篇相关主题的研究论文，主要聚焦以下核心问题并期待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此方面研究的开展有所参考。

1. 心理健康及相关概念的认识

心理健康是一个包含从消极的病理状态到积极的正向幸福状态的连续谱系，每一个体可能处于这一连续谱系中的某一个位置上。本专辑较为全

面地关注了心理健康的不同状态，不但聚焦了一直以来关注度最高的心理健康议题——心理疾病，如周晓璐与 Ryder 的《中国躯体化？中国人抑郁与焦虑症状的文化表达》探讨了在常态人群中较多出现的抑郁与焦虑，常保瑞和谢天的《情绪表达矛盾一定会带来心理症状吗？文化规范的调节作用》则关注了抑郁、焦虑、人际敏感和敌意等消极心理状态，而且有作者涉猎心理健康的积极正向的那一端，如瞿小敏的《空巢 VS. 满堂：居住安排对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及吴胜涛、姜颖、王毓洲、张雅婷的《生命的补偿控制：肿瘤幸存者的正义观与主观幸福感》更为关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等心理健康的正向维度。

日常生活事件赋予行动与存在以意义，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文化框架下予以解读，方可明晰其最本真的意义。“独立性”是西方心理健康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被看作人格特质发展中的一项任务（Cattell & Mead, 2008），且被 Bem (1981) 认为是男性工具性特质，西方社会期待女性是高依赖性和低独立性的。中国是一个倡导集体文化的熟人社会，女性更被期待为依赖者和联结者。本辑作者杨曦和李凌（2018）通过对高学历、高独立性女性的个案研究，发现我国本土文化下的“独立”内涵更为宽泛，更加具有辩证性，其内涵不但包含与西方文化中的独立含义相似的个人自立，而且包括能够依据不同情境进行行为调节的、基于人际互动的人际自立，不过其发展体现了从二元对立到共生共存的历程。

为了解释“我”与“物”或“他人”之间的“同一感”，“empathy”被立普斯引进心理治疗领域之中，用以代表心理治疗工作者想象地重建患者的感觉经验，设身处地地感受患者，以便更好地帮助患者。罗杰斯从西方哲学二元论的视角将“我”与“他人”看作对立的两极，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独立性以及同一感的“由我及彼”，因此，“empathy”要包括“认知性”的“empathy”和“情感性”的“empathy”。而在中国文化中，心性与生活境遇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情不离境，境不离人”，“empathy”是物、我、他人相互建构的“共在”关系，是一种强调直观感受与体验的“感”，因此，本辑作者蒋殿龙和赵旭东（2018）认为应该引导治疗师与患者把症状放在关系情境中进行考量，以入境的方式帮助患者在“共在”情境中更新与重塑感觉、体验、思考与行为方式，从而提升心理品质。他们的工作应该算作“指向以语言体系为本之意义结构的历史与哲学研究”，应该被看成“本土化”的基本功课。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实践智慧”（*Phronesis*），并指出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应该“对于什么是好的，必须能够深思熟虑

的”（尤淑茹，2010）。本辑的作者们以深描的方式建构属于中国社会文化脉络中的心理现实的内涵，彰显了学者们探索以生活现象为本的知识体系的决心与努力。

2. 心理健康状况：来自文化的作用

心理健康是社会文化建构，文化规范作为群体所确立的行为规则，可以使个体减少不确定感，获得意义及安全。Morris、Hong、Chiu 和 Liu (2015) 指出，文化规范作为社会整合、联结社会与个人的重要中间机制，具有文化整合功能。“个人与环境一致性假说” (Sagiv & Schwartz, 2000) 认为，文化环境提供了对文化规范重要性的支持和强化，与该文化环境一致的规范会与适应性的结果有正相关关系，而不管该规范或目标是什么。与西方文化相比，人际关系和谐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社会规范，中国文化抑制个体情绪的自由表达，因此，人们会通过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间的平衡来寻求一个中庸之道，以维护与他人关系的和谐 (Miyamoto & Ma, 2011)，因为随意表露情绪而不加以克制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梁亮、吴明证，2009）。本辑作者常保瑞和谢天 (2018) 通过对来自中国和美国这两种对情绪表达持不同态度的文化个体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尽管情绪表达矛盾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简称 AEE) 倾向较高的个体具有更为严重的心理症状，但是文化规范的差异使中美两国样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在低 AEE 水平时，美国样本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中国样本，随着 AEE 水平变得越来越高，美国样本的社会支持越来越低，而中国样本的社会支持无论是在高 AEE 还是在低 AEE 条件下几乎没有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在企业文化背景下，共享的文化假设是出于个人原因而寻求支持，给别人带来负担是不适宜的。

正义动机是一种相信“世界稳定有序、人们各得其所”的动机，西方大量研究表明它是一种反社会的观念体系，它会促使个体指责或贬低弱势群体。但是与西方的研究相左，中国人的公正世界信念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 (Wu et al., 2011; Wu, Cohen, & Han, 2015)。本辑作者吴胜涛、姜颖、王毓洲和张雅婷 (2018) 发现处于逆境中的肿瘤幸存者的公平世界信念并没有因为疾病威胁而减弱，且其正义动机能够更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这证明了颇具东方辩证思维的“天道酬勤”“祸福相依”等朴素的正义动机可以发挥补充控制源的作用，使弱势人群能够提升其生命控制感，进而保证其主观幸福感。

文化规范是外在性的规则系统，需要通过个体对其归属的社会群体认知，并从其获得的群体资格中得到情感与价值意义后才能发挥作用。文化

认同可提升个体遵从文化规范的可能性，并使个体获得认知安全感，即满足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尤其是当个体进入以外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环境时，母体文化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在逆境中的保护，能使其获得舒适和安全（Hong et al., 2013）。本辑作者利爱娟和杨伊生（2018）通过对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多民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个体与异文化个体互动过程中的安全与信任需要不能满足时，来自母体文化的认同能够对这种缺失进行补偿性满足，其中母体文化历史传承和具体符号表征会使母体文化认同对母体文化依恋的保护性作用有所加强，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舒适度，促进个体环境适应性。

文化作为一种集体现象，是符号性社会互动的产物，是指某群体特有的共享知识网络，包含一系列共享意义和共享知识，使某一人群得以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赵志裕、康萤仪，2011：18）。而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解释、症状表达及求助行为，根源于被文化所浸染的广大信念结构之中（陈芬苓、徐菁苹，2008）。以躯体化症状为例，波多黎各、墨西哥裔和白人，通常表现为胃痛、心悸和胸闷；而亚裔则更多表现为眩晕、头晕和视力模糊等心脏和前庭觉症状；在非洲和南美洲，躯体化症状有时表现为手脚灼烧感，感到脑袋里有虫在爬，或者有蚂蚁爬过皮肤的感觉。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体在症状表达上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主要在于个体在以文化所认可的症状或行为来表达自身模糊不清的困扰情绪和内在的冲突时，“病人们在无意识中努力地创造症状，以配合当下的医学诊断”，“文化以难以觉察的方式塑造人类在无意识中跟随大量的文化暗示”（伊森·沃特斯，2016：52）。本辑作者周晓璐和 Ryder（2018）从现代精神病理学早期对“文化症候群”的关注谈起，对心理病理文化差异研究中的抑郁的“中国躯体化”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在对“体验派”和“理解交流派”的解释差异的分析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文化—心理—大脑”解释框架，以解释中国人抑郁症状的“躯体化”和焦虑症状的“心理化”现象。在他们看来，个体往往是根据当前情境需要，报告或强调特定症状体验，以达到快速求助及避免污名等目的。而文化为如何表达症状提供了“文化文本”，躯体化是中国文化环境中抑郁症的文化脚本，心理化则可能是当下中国文化环境下焦虑症的文化文本。此观点与康萤仪、Morris、赵志裕和 Benet-Matinez（2010）的动态建构进路的文化心理学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文化以具体领域知识的松散网络形式被内化在个体心灵之中，个体通过文化框架的转换对社会环境中的线索进行反应，选择最具适应意义的方式以表达行为。